

八十年代中国人口迁移的转变

杨云彦

80年代是我国人口迁移特征纷繁变化的一个重要时期。首先,自80年代初以来,我国人口的迁移与流动日趋活跃,对社会经济生活产生着越来越大的影响;迁移的流向和形式也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人口迁移的宏观流向发生逆转,延续数百年的向北方迁移转换为向东南沿海迁移;城镇化进程加速,尤其小城镇得到高速发展;向稀疏地区进行开发性迁移转变为向人口稠密区的集聚性迁移,即由外延扩展型迁移转变为内涵发展型迁移;迁移类型与机制发生变化,计划迁移的比重下降;工业和第三产业移民占居主导地位。可以认为:80年代是我国人口迁移的一个转换阶段。这里根据1987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资料和第四次人口普查资料就我国人口迁移的转换特征及其发展的趋势进行简要分析。

人口迁移与流动加强

建国以来,在50年代末、60年代初曾有过一个迁移的活跃期。此后,直到70年代后期,人口的迁移和流动都受到严格控制而处于抑制状态[张,魏,1986]。改革开放促进了人口的迁移与流动,多种资料表明,近年来我国人口迁移与流动量迅速增长。据1987年的抽样调查资料,我国1982—1983年跨市镇县的迁移人数每年平均仅有363万,到1985—1986年增长到年均790万。另据第四次人口普查资料推算的结果,在1985—1990年间已增加到年均1053万(见表1)。

表1 80年代的年度平均迁移规模

(单位:千人)

年 度	省际迁移	内部迁移	合 计	迁移率(%) ^③
1982—1983 ^①	785	2842	3627	3.57
1983—1984	1048	4107	5155	5.03
1984—1985	1352	5606	6958	6.72
1985—1986	1681	6221	7902	7.56
1985—1990 ^②	2167	8366	10533	9.80

注:①②迁移数据的来源及推算过程见附注。

③迁移率定义为:(迁移人口数/年中总人口) × 1000。

流动人口的增长也很迅速。以北京、天津、上海、广州、沈阳五个大城市为例,据调查,1984—1988年五市流动人口总量由250万人上升到536万人,增幅达114%[北京市政府研究所,1991]。其它各类城市也有相似的情况。流动人口的迅速增长,成为城市生活中的一个极其活跃的部分。

我国人口迁移与流动剧增有着多方面的原因。首先是改革开放为人口的流动创造了一个较为宽松的环境,长期抑制之后的人的迁移动力的突然迸发,形成一个补偿性的迁移高峰,各种限制迁移与流动的政策松动

使自发迁移大量增加,其中有很多是早期计划迁移人口的回流。由于人们对这个突然变大的世界还来不及有更多的了解,因此其流动不可避免地带有盲目性。经济发展是人口流动加速的动力机制,伴随产业结构的转变,人口的地域结构也在发生巨大变化。人口年龄结构也是近年迁移与流动人口剧增的重要原因之一;在六、七十年代生育高峰期出生的人口现在正值

升学、就业、结婚年龄，是迁移的高峰年龄段〔杨，1989〕，以上种种情况的集合，形成一个巨大的迁移高峰。总之，80年代的人口迁移与流动，是新旧时期转换中的多种因素的复杂组合，它既是改革开放新形势的产物，又通过人口年龄结构及人口回流等反射出历史的印痕。

宏观流向逆转：扩散型向集聚型转换之一

在人口迁移和流动加速的同时，其流向也发生着急速的波动变化。首先是宏观流向的逆转。从省际迁移上看，1982—1987年间，北京、天津、河北、辽宁、上海、江苏、山东、湖北、广东（含海南）、宁夏十个省区为人口净迁入，它们绝大多数是经济发达或较发达省份；从地理位置上看，十个净迁入省份，八个在我国东部沿海地带，一个在中部，一个在西部。传统迁入省份如黑龙江、新疆、青海及内蒙古等均已变为净迁出。在1985—1990年间，这种省际迁移格局发生了细小的变化：青海和新疆等省区又成为净迁入区，但东部和中部也增加了净迁入省份，东部沿海地区的净迁入省份增加到10个，中部增加到2个，西部则增加到3个（表2）。尽管这种省际迁移格局有着补偿性质，如黑龙江，新疆等地之成为净迁出区，与早期迁入的移民大量迁回原籍有关，但省际迁移的大方向已基本定型，我国人口迁移的宏观流向已从向西、北人口稀疏地区的扩散转变为向东南人口稠密区的集聚。

表 2 各省市区净迁移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

地 区 别	1982—1987 ^①	1985—1990 ^②	地 区 别	1985—1987 ^①	1985—1990 ^②
北 京	2.27	5.02	河 南	-0.07	-0.10
天 津	1.03	2.57	湖 北	0.10	0.12
河 北	0.39	-0.32	湖 南	-0.28	-0.42
山 西	-0.06	0.15	广 东	0.22	1.46
内 蒙 古	-0.18	-0.18	广 西	-0.39	-0.93
辽 宁	0.22	0.62	海 南	0.00 ^③	0.34
吉 林	-0.30	-0.37	四 川	-0.08	-0.79
黑 龙 江	-0.76	-0.74	贵 州	-0.03	-0.34
上 海	2.35	3.80	云 南	-0.25	-0.10
江 苏	0.24	0.37	西 藏	-1.68	-2.21
浙 江	-0.28	-0.73	陕 西	-0.19	-0.08
安 徽	-0.16	-0.34	甘 肃	-0.46	-0.48
福 建	-0.07	0.23	青 海	-1.73	0.14
江 西	-0.12	-0.13	宁 夏	0.96	0.48
山 东	0.26	0.10	新 疆	-0.26	0.42

注：①②分别为1982—1987年移民总数，1985—1990年移民总数占1987年及1990年年中人口的比重。

③1987年海南尚未建省。

资料来源：《中国1987年1%人口抽样调查资料》（全国分册），国家统计局人口司编，1988；

《中国1990年人口普查10%抽样资料》，国务院人口普查办/国家统计局人口司编，1991。

我国人口宏观流向的逆转，一方面是农业资源与劳动力分布的宏观配置达到平衡的结果，另一方面，与我国经济发展重心向沿海的转移相关，开放政策促进了沿海地区的经济发展，吸引了大批劳动力。

此外，代际转换也是宏观流向变动、逆转的一个重要原因。80年代的迁移是在回流人群与新一代的迁移人群间的交错转换。在80年代早期的迁移人群中，回迁人群占有重要地位。这部分回迁人群中，有老一代的移民，他们在五、六十年代或组织，或自发地由沿海地区迁往内地和边疆，作为一代开拓对内地建设和边疆开发作出了重大贡献。但对故土的眷恋和

随着家乡经济形势的好转他们中许多人迁回了故里。在回迁移民中，还有过去年代中一些带强制性迁移的人群，在政策松动后他们或自发，或以落实政策的形式迁回原籍。

回流在很大程度上使一些传统迁入区成为净迁出区，如从黑龙江、内蒙古、新疆等地迁出的人口大多是早期的迁入人口，这些人一般都迁回原籍。

在老一辈移民迁回原籍的时候，新一辈移民又开始他们的迁移。他们选择的流向与其父辈不尽相同，但也有一部分沿袭其父辈迁移的足迹，迁往边远地区。这也是新疆、青海等地在经过短暂的净迁出后复变为净迁入区的原因之一，但新移民主要是从事工业和其它非农产业。

城镇化加速：扩散型向集聚型转换之二

扩散型向集聚型转换的中观特征是向城镇的迁移和流动成为主要类型。

在按迁入/迁出地的城乡特性分的4种组合中，我们定义城镇—城镇及农村—农村为同级迁移，农村—城镇为上向迁移，城镇—农村为逆向迁移。在这四种迁移类型中，长期以同级迁移即城镇—城镇，农村—农村为主，如由沿海城市迁往内地新兴城市，或由内地农村迁往边远地区农村等；甚至还出现过大量的逆向迁移即由城镇到农村的人口流动。80年代的人口流向已转变为上向迁移占主导地位，从表3可看出1985—1990年省际迁移中上向迁移、同级迁移（包括市—镇与镇—市迁移）与逆向迁移所占的比重分别为：44.6%、50.9%和4.6%；省内跨县市迁移的比例构成分别为：50.4%、45.7%和3.9%。若考虑县市内部的迁移，则上向迁移所占的比重可能要更高一些[朱，1991]。按上述比例推算，在每年的1084万移民中，至少有500万人从农村迁入城镇。

我国的城镇化发展也带有补偿性质。与工业发展水平相比，我国的城镇化水平明显偏低，这与长期以来我们对城市发展采取的封闭战略有关。改革在一定程度上打开了城镇的大门，为农村人口流入城镇提供了可能性。就业渠道的拓展以及劳动人事制度方面的改革为人才流动提供了条件。

表 3 1985—1990年人口迁移城乡流向分布(%)

省 际 迁 移			省 内 跨 县 市 迁 移		
城 市 街 道	镇	乡	城 市 街 道	镇	乡
市	18.1	8.1	市	10.0	14.3
镇	4.4	4.1	镇	3.4	5.0
县	2.9	1.7	县	2.0	1.9
		31.6			39.3
		13.0			11.1
		16.2			13.0

注：表中的迁出地和迁入地在城乡口径划分上不一致，也没有反映县市内的城乡迁移，因而不能很准确地反映五年中的城乡流向。参见[朱，1991]。

资料来源：同表2。

与上向迁移相对应，移民的产业转变也在加速。在同级迁移中，迁移一般不会导致人口的产业转变。但在城镇化过程中，伴随地域变化，移居职业也发生了变化。它标志着农业扩散移民的结束及工业移民与人口城镇化的开端。

迁移机制转换

我国人口迁移与流动的一个重要变化是机制的转换。过去的迁移形式以计划迁移为主，自发迁移是受到抑制甚至禁止的。近年来，计划迁移所占比重下降，自发迁移比重上升。一

个明显的表现就是暂住人口的迅速增长。在1982年第三次人口普查时，暂住人口（即常住本地，户口在外地的人口）仅占总人口的0.66%，到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时，暂住人口比重已增加到1.88%。

迁移原因构成上的变化也反映出这一趋势。从表4可看出，工作调动，分配工作，学习培训，随迁家属等以计划迁移为主的迁移类型所占比重明显下降，而自发迁移类的比重上升。

但应注意到，计划迁移是国家在宏观利益基础上对人口和劳动力的地区分布进行调整的重要途径，其决策层次和作为行为主体的个人不同。而自发迁移则是个人在微观利益基础上作出的决策。如果存在利益层次冲突，则要么计划迁移的稳定性较差，要么自发迁移成为真正的“盲流”。过去我国组织的很多迁移稳定度不高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没有协调好两者的利益，单纯依靠行政手段进行直接干预。但对人口尤其是劳动力的合理布局，也不能放任自流。自发迁移的增长，可能影响到人口流向的宏观合理性，因此必需加强宏观调控。但对迁移和流动的调控应以间接调控方式为主。

社会型迁移比重下降

在一个封闭落后的自然经济结构中，人口流动也是相对禁止的，仅有一些伴随社会生活而产生的迁移流动如婚嫁迁移等。随着经济的发展和走向开放，与经济活动有关的人口迁移与流动将迅速增长，在总迁移中所占比重将不断提高。我国近年来人口迁移原因构成的变化也反映出这一趋势。以省际迁移的迁移原因构成作比较，在80年代前期，婚姻迁入还占有很大比重，到80年代后期，婚姻迁入的比重就有明显下降，而务工经商的比重则大大提高，其它类型迁移的比重都有不同程度的下降。其中，社会型迁移（投亲靠友，退休退职，随迁家属，婚姻迁入）所占的比重由前期的51.5%降到后期的32.1%，而经济型迁移（工作调动，分配工作，务工经商）的比重则由前期的33.9%上升到后期的48.6%（见表4）。

表4 省际迁移原因构成（%）

	1982—1986	1985—1990
工作调动	20.6	14.5
分配工作	5.1	4.7
务工经商	8.2	29.4
学习培训	8.7	7.8
投亲靠友	13.3	10.6
退休退职	2.6	1.5
随迁家属	19.8	10.8
婚姻迁入	15.8	14.2
其它	6.0	6.5

资料来源：同表2

我国人口迁移与流动的转变，有着内在的成因。

泽林斯基(Zelinsky)根据西方国家的历史经验，将“人口转变”理论，城市化及工业化过程结合起来，提出了“流动转变”理论。按他的理论，人类迁移活动存在五个阶段，第一阶段为前工业化社会，人口的自然增长处于高位平衡时期，出生率和死亡率都很高，人口增长缓慢，人口迁移活动也不活跃，仅有少量日常社会、经济及文化活动所引起的人口流动。第二阶段为早期转变社会，在此期间，人口的自然增长处于转变阶段，死亡率迅速下降，人口自然增长率提高，农村剩余劳动力增多，于是向外围地区扩散，另一方面，由于工业的迅速发展，带动了城市的高速增长，大量农村人口涌入城市，人口流动明显增加。第三阶段为转变后期，此时人口出生率开始下降，人口增长速度趋缓，同时农村劳动力已大量转移到城市，由农村向城市迁移的势头趋缓但绝对规模仍很大，开发边疆的迁移减少或停止，人口流动进一步增长。第四阶段为发达社会，此时人口自然增长已完成转变，达到低出生、低死亡率的低位静止，而迁移则在较高水平上达到平衡，城乡迁移仍在继续，但绝对量与相对量都已很小，城市间及城

市内部的迁移增加，与外部的迁移也有增长，各类人口流动达到高峰；第五阶段为高度发达社会，由于信息技术的发展，替代了一部分人口流动，整个社会的人口流动将减少 [泽林斯基, 1971; P.Ogden, 1984]。

泽林斯基的“流动转变”理论更多的是对发达国家所经历过的几种发展形态的归纳，这几种形态在发展过程中是否有着严格的先后次序，是否适用于发展中国家，这些都有待进一步研究。这一理论所具有的重要价值在于，他把人口迁移流动与人口转变，工业化及城市化过程结合起来，从更广阔的视角来分析人口的迁移与流动。

我国人口迁移与流动目前的转变与泽林斯基的转变论有类似之处：当前的中国人口形势是人口转变、城镇化与经济发展的历史性重合。这一时期可以说是中国人口史上一个至为重要和关键的时期。我国人口自然增长正在经历着从高出生率、高死亡率向低出生率、低死亡率的转变，建国以来工业得到长足发展，改革开放以来城镇化进入一个迅速发展时期。在这种情况下，人口迁移与流动的加剧正是伴随经济发展与工业化而产生的一种社会现象，是一种历史的必然。因此，在这一转变时刻，在各种纷繁的人口经济社会现象中研究其相互关系和规律，把握其发展趋势，是时代给人口学研究留下的重任。其中一个曾被忽视的而又越来越重要的内容就是人口迁移规律及其发展趋势的研究。迁移规律及其预测既是人口研究中的一个难点，又是未来研究与决策的一个热点问题。

(作者工作单位：中南财经大学经济研究所)

附注：1987年1%抽样调查的迁移资料与1990年人口普查的迁移数据的比较问题：

1. 1982—1986年分年度的迁移数据来源于1987年1%抽样资料。在1987年调查的迁移数据中，包括有离开户口登记地半年至一年的移民，这种情况在1990年未作移民登记，因此应剔除。在去除1986—1987年的数据后，其它各年度的移民在迁入地的居住时间不少于一年，因而在口径上与第四次普查资料是可比的。

2. 1985—1990年的年度平均数是根据1990年人口普查10%抽样资料推算的数字。由于第四次普查资料只有跨省、县及市的迁移，没有调查县市内跨市镇县的迁移，因而比1987年1%抽样调查统计的迁移口径要小。为与1987年的资料相比较，我们按1982—1986年省内跨市镇县迁移对省际迁移的平均比例对第四次普查资料的内部迁移进行了放大，推算出按1987年抽样调查口径统计的1985—1990年的省内跨市镇县的迁移人数为4183万。即：

	五年合计	省际迁移	省内迁移
普查10%汇总数	1985—1990	1083626	2300435
按1987年口径调整数	1985—1990	1083626	4182796=(1083626×3.86)

参考文献：

1. 北京市人民政府研究室社会处：“关于八大城市流动人口问题的综合报告”，《社会学研究》，1991年第3期。
2. 张庆五、魏津生：“五十年代以来中国国内人口迁移的基本格局和特点”，《中国人口年鉴1986》。
3. 杨云彦：“当代中国人口迁移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1989。
4. 朱宝树：“从第四次人口普查看县市内乡村人口城镇化态势”，《高校第四次中国人口普查资料分析学术讨论会》论文，1991年11月，北京。
5. 泽林斯基：“流动转变理论”，美国《地理研究》，1971年第2期。
6. P.Ogden, Migration and Geographical Change, Cambridge Univ Press, 1984.